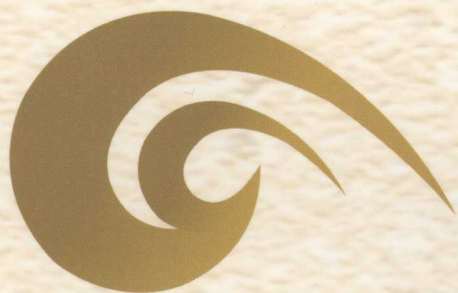


中国农村研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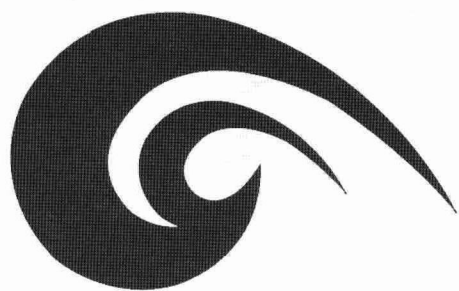
集市政治 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

——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

吴晓燕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农村研究书系



集市政治 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

——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

吴晓燕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 / 吴晓燕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0

(中国农村研究书系)

ISBN 978-7-5004-7265-0

I. 集… II. 吴… III. 集市贸易 - 研究 - 中国 IV. F7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2050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福瑞来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6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 勇

副主编 项继权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石 挺	刘筱红 (女)
卢福营	邓大才	宋亚平
李德芳	吴 琦	吴理财
项继权	徐 勇	唐 鸣
高秉雄	曹 阳	曾菊新
董江爱 (女)		

出版说明

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也成为学术界最重要的学术对象之一。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人员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农村基层政权研究，1990 年前后由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系列丛书。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为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并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村治书系”。到新世纪初，我们的研究领域由村治扩展到乡村治理，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乡村治理书系”。现在，我们决定以“中国农村研究书系”作为本中心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其理由：一是自 2000 年本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其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不仅以乡村治理为研究重点，而且涉及到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文化、农村教育、农村历史等。原有的书系名称已无法涵盖现有的研究内容。二是学术研究贵在持之以恒，更在于是一项以探求学理为唯一使命的事业。中国的学术由于一直伴随着问题而经常非学理化。“三农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农村研究”作为本中心一个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将致力于中国农村的实证调查和学理研究，以此标志我们进一步的学术自觉。

编委会
2005 年 5 月

序一 方法论的自发、自觉与自为

弹指一挥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已经有 25 年，从人生的周期来看，已经进入青年时期，但是对于需要传承、传统，需要积淀、积累的团队建设、学科发展、研究风格来看，25 年的时间只是一个起步时间。回首 25 年华师农村政治研究方法，经历了一次转型、两个阶段，即从自发的实证研究阶段转向自觉的实证研究阶段，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转型，但是转型尚未完成，也远没有达到自为的实证研究方法阶段。

方法论的自发阶段。改革开放不久，已经退休的张厚安老先生老骥伏枥，牵头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学术宗旨，高举实地调查的大旗，深入农村、深入基层，用脚来做学问。我们坚信，要做好研究，必须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从现实中寻求问题的求解之道。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中心的主要方法：下乡调查——撰写调查报告——提出对策建议。问题研究是此阶段研究的主要目标。当时并没有考虑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跳跃问题，也没有考虑材料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没有考虑到分析框架和理论建构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处于一种自发、自然的状态，感觉到做农村研究就是要调查，但是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的农村调查，事实材料如何使用，如何从实然转向应然，如何连接材料与理论，则鲜有方法论指导，也没有较为规范的研究模式借鉴，处于一种方法论的自发启蒙状态。

方法论的自觉阶段。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加深，随着中心研究人员的成熟，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心研究人员从方法的自发阶段进入到方法论的自觉阶段。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始进入中心，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社会学的深度访谈、统计学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以及经济学的计量分析、博弈分析、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理论等研究工具和分析框架开始为中心学者和学生使用。调查研究主要是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问卷调

查；研究方式超越了调查报告阶段，明白了研究人员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研究目标和研究重点从应然转向实然、从问题研究转向理论建构；微观个案研究成为这个阶段主要研究方法，跨个案的比较研究、历史实证研究也开始出现。我的《中国村民自治》、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村级治理》、于建嵘的《岳村政治》是这个阶段的开端，随后吴森的《乡村政治过程：生产经营与秩序建构》、孟伟的《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等著作，则是实证研究方法的自觉阶段的发展，本系列中的四本书也属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典型的特点就是主动地模仿经典实证研究著作，积极的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发现问题、解释底层社会的政治现象，也就是我所说的生活政治的研究。

方法论的自为阶段。如果将方法论的学习、模仿、运用和创新分为三个阶段，即自发阶段、自觉阶段、自为阶段，目前华师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应该处在第二个阶段的中期，即大部分研究人员和硕博士能够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但是还没有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没有达到信手拈来、非常熟练的程度，更不用说达到了方法论的自为阶段。所谓方法论的自为阶段，应该是除了熟练的掌握实证研究的方法，明白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内在逻辑，而且还要具有创新实证研究方法的能力，能够将新的研究工具、新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农村政治实证研究中来，能够通过整合、借鉴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推进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方法和水平的提升，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自觉阶段能够“随心所欲”的运用农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自为阶段不仅能够“随心所欲”，而且还能够“创新”方法而“不逾矩”。我们现在离这一阶段还有一定的距离。

从中心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掌握程度来看，本系列四本书属于第二个阶段，能够达到第二阶段也殊属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也有诸多发现。总体来说四本书大体都是从底层的视角，研究生活政治，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是社会史或者社会生活史范畴；按照人类学家的说法，属于政治人类学的范围；按照政治学家的说法属于政治社会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范畴。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四本书的选题都比较新颖、视角独特，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别出心裁。

樊红敏博士的《县域政治：权力实践与日常秩序——河南省南河市的体验观察与阐释》，以县为研究单位，以地方政治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和分析起点，研究县域日常政治，作者试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县域日常政

治是如何展开的？县域政治权力运作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实践形态？它的运作机制是什么？从它的运作我们可以看到县域政治包含什么样的特征？按照作者的理解和界定，所谓日常政治是指具体的、动态的、繁杂的平常的政治活动，即政治生活的实际运作过程。作者选择日常政治中特定的场景、关键词或“微小实践”作为阐释地方政治实践的切入点，再以地方性的话语，给予学理上的解读，并赋予其理论内涵。通过实证研究，作者发现，地方政治权力运作的实践形态呈现为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县域政治呈现为结构与运作的二元化特征，台前的“正式文本”与台后的“剧场运作”共同构成地方日常政治生活的全部。

吴晓燕博士的《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以建国后的乡镇集市为研究对象，将集市纳入国家对乡村社会整合的历程中来考察。作者从纵横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在纵向维度，通过考察建国以后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的曲折历程，透视国家政治权力与集市兴衰的关系，探讨国家权力是如何借助集市空间渗入乡村社会的；在横向维度，以三中全会后集市贸易的恢复发展为背景，从市场规则、主体、空间三个层面展示集市活动和市场社区运行的现状，描叙多元主体的参与、利益的分割和空间的互动，以呈现“国家在场”背景下经济社会的自我整合与秩序建构趋势。通过实证研究，作者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集市作为一个经济交换活动的场所，其规则和秩序的形成既有国家建构的痕迹，也是社会自我生成的动因。现代国家成立以后，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共同建构和改造着集市，集市的参与主体也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着国家与集市。

任宝玉博士的《财源政治：“财政下乡”视角下的财政合法性研究——河南省刘乡的个案研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个案乡20多年乡镇财政水平的变化、财政合法性基础及其演变、财政与乡镇政权建设关系的深入考察，提出和探讨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问题，并得出了五个结论：乡镇财政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县乡财政关系和财政体制是制约乡镇财政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在传统财政治理体制下，农民负担水平是影响乡镇政府财政合法性以及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变量；在影响乡镇财政合法性的诸因素中，乡镇财政治理体制及治理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税费改革提升了乡镇财政的合法性，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合法性问题。

邓大才教授的《土地政治：地主、佃农与国家——从价格和交易成

本角度的考察》与前三本书有所不同，主要采用历史文本分析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作者从大历史的角度，以农地流转的价格为研究对象，以交易成本为分析工具，考察地主、佃农和国家如何通过交易成本影响土地价格。作者运用博弈论建构了一个简单的三方博弈模型，考察地主、佃农和国家三者的互动关系。经过历史与计量分析，作者认为，交易成本既可以促使土地流转价格上升，也可以诱致流转价格下降；制度安排既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也制造交易成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各有调节空间和范围，只有较好地处理两者的度，才能够最大化节约交易成本；国家——地主——佃农以交易成本为工具影响三方的力量均衡，佃农和自耕农以反抗和暴力制造交易成本推动王朝更替和租佃价格下降、土地买卖价格上涨；反抗和暴力源于国家对民间财力的吸纳——特别是以土地为目标的赋税制度，国家既是自己的缔造者，也是自己的掘墓者；当今农地流转市场既是传统农地市场的延伸，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在外部就业机会及国家财力基础较慢扎实的条件下，承包地流转不会重蹈土地兼并和王朝更替的覆辙。

四本著作都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资料详细，结论比较有趣，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时都不同程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掌握并不完全熟练，有些文章运用时比较生硬；二是对实证研究有一定的顾虑，担心实证研究没有理论，有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为理论而理论”的对话和议论；三是材料与理论、事实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明确，特别是不少结论还有进一步提升和抽象的空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四本著作的实证研究及生活政治的探讨，既是作者在学术海洋中的实证试游，也是华师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的进步。我相信，在中心研究人员及硕博研究生的共同努力，中心的实证研究一定能够自发走向自觉、从自觉走向自为。

徐勇

2008年2月于武汉桂子山

序二

我非常高兴地为本书作序。因为这是我指导的女性博士生“日常生活政治研究博士论文系列”的第三篇。第一篇是2006届博士孟伟的论文“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以1998—2005年间城市业主维权行动为例”。该论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较为系统研究城市业主维权行动的论文，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第二篇是2007届博士樊红敏的论文“日常生活视角下地方权力运作研究——河南省黄市的体验观察与阐释”，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研究县域政治在我国还较少见，毕业第二年她便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一举申报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书作者在其师姐们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以集市社会生活为基础研究政治的发生与运行。

集市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虽然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相当一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可以自给自足，但也有更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需要与社会交换。可以说，一部社会进步史就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与社会交换愈益扩大的历史。而人们要与社会进行交换，就必须借助于场所，由此便产生了集市。集市犹如一根纽带将居住在不同地点的人联结起来，形成一个集市社会。如果说村落社会是一个初级社会群体，那么，集市社会则是更高一层的社会群体。美国学者施坚雅曾专门写过一部著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最早以四川省为实例研究中国农村集市的著作，只是这部书涉及的实例已经久远，且主要是一部经济社会学著作。近年来，关注农村集市，特别是四川省基层和地域社会的论著多了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笛的研究。

与以上学者一样，本书的作者也是以四川省集市和地方性社会为实例，但有所不同的是作者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集市社会。这是本书独特性的首要之处。以往的政治学对于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集市

是从不在意的。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学只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为政之道，传统政治也只是宫廷政治和衙门政治，田野无政治，有集市而无政治。近代以来的政治更多是动员政治，着力点是“翻天覆地”，政治学也主要是革命性的宏大话语。尽管革命性话语中也提到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动员策略，还未转换为一种学理。只是随着进入改革年代，急风骤雨的革命时代向和平建设时代的转换，才促使政治学研究视野的转换。本人 1992 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因此将政治分为上层政治和基层社会政治，并认为后者在社会发展中可能更具有基础性或者决定性意义。但是，当时还只是一种基本思路，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由社会生活而产生的政治。本书的作者原来学习经济学，入读我指导的博士生以后，我便引导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集市经济社会，从而将集市引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阈中来。从这个角度看，这可能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

研究集市政治，不仅仅在于这是一个学术空白，更主要的是中国的集市社会与政治的关联度太大。近些年，市民社会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论题。事实上，中国的集市比西方社会产生得更久远，但中国的集市始终未能生长出所谓的“市民社会”。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民间社会之上长期高耸着一个巨大的权力金字塔，并抑制着商业经济的发育和生长。西方的商品经济是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生长出来的，而且与这种新经济相伴随的是新国家的产生，从而使经济与政治相得益彰。中国的集市社会虽然发育出新的经济要素，但这一新要素始终停留在幼苗阶段，无法发育成长。近年来，有人将四川的“茶馆”比附于西方的咖啡馆，实在是太具有想象力了。西方的咖啡馆可以谈论公共事务，形成公众舆论，产生公民政治。而中国的茶馆一进去就会见到四个大字：“莫谈国是”，中国的茶馆始终只是远离政治的民间社会，谈论的主要是非政治话语，根本无法影响政治过程。即使如此，20 世纪中叶后的 30 多年，国家更是以强大的力量抑制，以至取消集市。但是，伴随改革开放，集市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日趋活跃。然而，如今的集市远非昔日自然状态下的集市。在集市社会里，国家力量并没有退出，而是以新的方式渗透并调控集市社会。当然，在集市社会内部也正在兴起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当今集市社会的权威和秩序正是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型构而成的，只是这种型构与理想类型还有相当距离。国家力量尚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有过度干预，也有干预不

够，更有与国家扮演公平公正角色不相干的诸多行为，成为集市社会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仲裁者。集市社会正在发育，但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传统的“民间社会”层面上，甚至有些“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成分。如果说传统乡村曾经有一批“地痞”、“游民”，如今集市社会中却存在着第一批“小混混”。“混混”可以说是如今活跃在底层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群体，连地方和基层政府都不可小视。存在并不一定合理，但首先得正视其存在。本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以一个集市为实例，对川东圆通场集市社会的各方面进行了详尽、生动和具体的描述，并从中挖掘出权力生成与运行的社会底蕴，展现出特有的集市政治。

坦率地说，作者选取博士论文题后，我对其能否拿出像样的论文是没有底的。一则这一选题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几乎没有多少直接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二则作者以往学习的是经济学专业，政治学专业修养还不深厚；三则作者为在职攻读，在读书期间还有相当多的教学和行政工作要做；四则作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得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且她又是一个极具家庭责任感的人。没有想到的是她不仅在预定的时间内提交了论文，其内容更是让我喜出望外，有相当的分量。论文答辩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也使我想到这几年我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将事当事做，把人当人看。对于任何一件事，首先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认认真真去做一件事情，有一种敬业精神。这是当今社会最为稀缺，也是最需要倡导的。西方社会得以由粗鄙的商品经济走向制度化的市场经济，得益于一种能够将“赚钱”也视之为“天职”的敬业意识。当然，一个以逐利为目的的市场社会并不是完全“物化”或排斥人与人的合理性交往的。恰恰相反，成熟的市场社会一直伴随着“人本主义”精神和人与人交往的合理规范。而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大程度在于许多人不仅不将事当事做，更是在做人方面长期停留在“混混”的层面上。也正因为如此，能够将事当事做，将人当人看的人不仅能够做好事，而且能够做好人。本书的作者正好印证了我的这一认识。她的最大长处一是对事认真，对学问充满着敬畏，为了一个事实、一个概念而苦苦发现和钻研；二是对人认真，不仅对师长，而且只要有专门学问者，她都抱有一种敬重之心。她也因此获得了最大的回报。你将事当事做，就能做成事；你将人当人看，就能得到他人的支持。因此，本书不仅是知识的载体，同时也充满着作者的一种做事做人的态度。而这是最难得的！

我曾经对作者说过，人的一生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做博士论文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了，但博士学位的取得毕竟还只是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作者对集市政治的研究还仅仅只是开始，还有更多的学问有待研究。这也是我对几位女博士日后发展的一丝丝隐忧。研究日常生活政治的三个女博士（明年还会有一位毕业），各有长处。孟伟视野开阔，知识宽广；樊红敏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吴晓燕讷言敏行，深思熟虑。她们如果能够将做博士论文的精神坚持下去，是能够做出更大成就的。只是中国的女性角色对她们也有诸多限制，可能使她们的学术发展受到影响。这不是个别人，而是迄今知识界少有杰出学术女性的普遍性反映。不过，我相信，只要她们能够将做博士论文期间的精神保持下去，是能够取得更多令人骄傲的成果的。我期待着！

徐 勇

2008年6月于武汉桂子山

目 录

序一	徐勇 (1)
序二	徐勇 (5)
导论	(1)
一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1)
(一) 乡村社会研究两种逻辑起点的启示	(1)
(二) 集市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历史和现实地位的考察	(5)
(三) 国家与集市(镇)两类“权力集装箱”对接的思考	(9)
二 文献梳理与研究视角	(12)
(一) 集市研究已有成果的检视	(12)
(二) 公共空间研究疏议	(24)
(三) 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	(28)
三 核心概念与个案情况	(30)
(一) 主要概念说明	(30)
(二) 个案情况与材料来源	(35)
第一章 集市兴衰:农民与国家	(41)
一 传承与恢复	(42)
(一) 市场复苏	(42)
(二) 国家介入	(45)
(三) 场市自治	(48)
二 统购统销	(50)
(一) 粮油统购统销	(51)
(二) 供销社对农村市场的垄断	(65)
(三) 设置食品站	(73)
三 自由市场	(75)
(一) 逐步收紧	(77)

(二) 时开时闭	(81)
(三) 全面控束	(88)
四 “黑市”	(92)
(一) 不可抑制的市场	(92)
(二) 生存逻辑支配的交易	(94)
五 放开搞活	(99)
(一) 废除粮油统购	(100)
(二) 发展个体商业	(103)
(三) 恢复集市贸易	(104)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政治权力	(107)
第二章 集市规则：利益与秩序	(112)
一 大政策	(112)
(一) 规划	(114)
(二) 管理	(122)
(三) 收费（税）	(132)
二 土办法	(142)
(一) 以地生财	(142)
(二) 捆绑服务	(154)
(三) 垄断经营	(157)
三 潜规则	(161)
(一) 执照的“真”与“假”	(161)
(二) 税费的“讲”与“磨”	(163)
(三) 保障的“虚”与“实”	(169)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经济权力	(180)
第三章 集市主体：更迭与纷争	(182)
一 “坐贾”与“流商”	(183)
(一) 领头羊	(185)
(二) 挑战者	(194)
(三) “爱恨交织”	(199)
二 新入者与原居民	(203)
(一) 新居民进入	(203)
(二) 场市格局改变	(206)

(三) 河水污染之争	(208)
(四) 往昔只可追忆	(210)
三 “混混”与摊主	(214)
(一) “不可或缺”的力量	(215)
(二) “执勤”与“揩油”	(218)
(三) “身份转换”	(223)
四 消逝者与边缘人	(226)
(一) 行将失业的媒婆和传统匠人	(226)
(二) “变味”的民间艺人与算命先生	(230)
(三) 生意红火的砖匠和游医	(233)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社会权力	(234)
第四章 集市空间：沟通与整合	(238)
一 棚市和店铺	(239)
(一) 生人交易	(239)
(二) 熟人社会	(242)
(三) 关系圈子	(246)
二 茶馆和饭馆	(249)
(一) 今昔犹存	(249)
(二) 坐茶馆	(253)
(三) 进饭馆	(262)
三 街头和坝子	(265)
(一) 街坝活动政治化	(267)
(二) 商业和社会空间的回归	(271)
(三) 街头话语的变迁	(278)
四 电话亭与网吧	(280)
(一) 商情、亲情和友情的连接	(280)
(二) 一线连通大千世界	(285)
(三) 现代信息与权力	(288)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文化权力	(290)
结论与讨论	(294)
一 基本结论的阐释	(295)
二 集市政治：延伸的讨论	(303)

参考文献	(310)
附录	(322)
后记	(334)